

〔美〕杰西·H·谢拉 著

图书馆学引论

张沙丽 译 张舒平 校



兰州大学出版社

〔美〕杰西·H·谢拉 著

图书馆学引论

张沙丽 译 张舒平 校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6

Jesse H. Shera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本书根据 Libraries Unlimited, Inc.
Littleton, Colorado 1976年版译出

图 书 馆 学 引 论
(美)杰西·H·谢拉著
张沙丽 译 张舒平 校

*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兰州市天水路78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静宁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4.6 字数:31.4千字
1986年4月第一版 1986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统一书号:7402·1 定价:2.95元



杰西·H·谢拉

(1903—1982)

2AA83/06

“人受益于书籍者很多，
受益于老师者更多，
受益于学生者最多。”

谨以此书献给
三十多年来我所教过的学生们

——作 者

序 言

近几年来，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界对国外同行的研究介绍大大加强了。全国几十个专业刊物，几乎每期都有全译、编译、报导、简介国外同行进展的资料。由于以前的封闭，不了解情况，一经开放接触，就觉得自己落后，有很多新奇的事情，急于想学到手，抓住一点就要引进，这是很自然的。这些资料也确实开扩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学到了不少东西。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些译介的资料，又觉得有点不足，显得零碎、杂乱、重复，让人理不清头绪，有些只介绍了现象，没有抓住其社会背景和发展的主流。作为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我国图书情报事业要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对国外同行现代化的经验的介绍，对他们的理论、技术、方法的引进，还是很有必要的。但在方式方法上应当有所改进，最好不要看到一点就译介发表，要做点分析、比较、选择，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要抓住一些基本的东西，从历史发展和理论分析的角度做一点研究，例如：

第一，对几个主要国家的图书情报事业分别做综合研究：原有基础和社会背景；近几十年所走过的道路和关键性的步骤；国家制定和实行的有关政策法规；其现代化的成败得失。在分别研究的基础上，再做比较研究。

第二，对有代表性的理论、学派、人物的研究：他们的主要观点，代表性著作，在事业实践中的反响和作用。

第三，对关键性的技术方法和设备的研究：不仅要了解技术方法和设备的本身，也要注意其产生及应用的 社会 背景，主客观条件和实际效益，包括某些不成功的经验，或不同的评价意见，也应予以注意。

这样，我们才可能对于国外同行，对于现代化及其进程有个清醒的认识，便于我们结合自己的情况决定取舍，参考借鉴，不至于让连篇累牍的文章使人看得眼花缭乱，或者无所适从，或者花钱上当。

根据以上的思想，我很赞成兰州大学图书馆学系翻译谢拉的《图书馆学引论》。

杰西·豪克·谢拉（1903—1982）是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又是教育家和哲学家。他于1903年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奥克斯福德。1925年在迈阿密大学获文学士学位，两年之后获得耶鲁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44年，当他四十一岁时，又获得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博士学位。

谢拉经历了丰富的图书情报工作实践。在获得硕士学位以后，他先在迈阿密大学图书馆就职，接着又在斯克里普斯基金会图书馆担任编目员和助理研究员。十一年以后，他花了三年时间攻读博士学位课程，又去国会图书馆任职，曾任美国战略服务署中央情报部分析研究科的副主任。在他管理的图书馆，使用了制表机，穿孔卡片等装置，他应用主题标引和叙词表，进行资料的著录，分编、存贮、研究，对图书馆工作机械化做了一些尝试。1944年谢拉出任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先后主管过技术服务和公共服务工作。1947年，

即获得硕士学位二十年之后，谢拉成为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的正式教员。此后他自然非常关心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但更多的精力和贡献是在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和研究方面。1950年他和玛格丽特·伊根共同筹备发起了目录组织会议，1952年他领导重建了美国文献学会（美国情报科学学会的前身），接着受聘为西部后备大学图书馆学院的院长。这一任命使谢拉获得一个良好的研究和讲学的环境，同时也使该学院出现新的局面。他在该校建立了文献与通讯研究中心，对开展刚刚显露头角的情报检索教学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1956年在这个中心召开了题为“记录知识的实际应用”的国际会议，有来自世界各国商业、工业、政界、科学界和图书馆学界的代表700多人与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六十年代初谢拉定作了高速电子检索机，以全新的机械检索手段代替了文献与通讯研究中心原有的传统的情报存贮、检索方法。可见谢拉既是一位走在发展前列的图书情报工作者，又是杰出的图书情报学研究者、教育家。

谢拉精力旺盛，在担任西部后备大学图书馆学院院长、图书馆负责人、掌握文献与通讯研究中心全部活动、兼任教学工作的同时，还从事多方面的活动。1953—1960年担任过《美国文献学会会刊》编辑；1954—1959年任西部后备大学出版社主编；1961—1968年为《威尔逊图书馆公报》专栏文章撰稿人；直到晚年还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百科全书》执笔写稿。他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各个方面：社会和文化、历史、目录学、机械检索、专业教育等。据罗斯基编辑的《关于图书馆理论：回忆谢拉文集》一书的记录，谢拉在1971年以前的著述就有381项。

谢拉的主要著作从五十年代开始相继问世。1950年他和玛格丽特·伊根合编了《书目组织》一书。1957年和阿伦·凯特，佩里·詹姆斯合著了《文献工作中的情报系统》。1965年他的重要著作之一《图书馆与知识组织》出版。这本书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一）总论，着重论述图书馆工作的原理——社会认识论，同时分析了书目理论的基础；

（二）分类和编目，他认为分类（包括标题法）是书目组织的基础，而书目组织是图书馆组织管理知识的基本手段；

（三）图书馆学教育。

我们知道，这三个方面实际是谢拉以毕生精力着重进行研究的领域，本书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他关于图书馆学的思想，他明确提出：“图书馆工作是知识的管理”。1966年英国著名图书情报学家D·J·福斯克特编辑出版了谢拉的另一本著作《文献工作与知识组织》，成为前一本书的姊妹篇。六十年代末期，印度著名图书馆学家S·R·阮冈纳赞邀请谢拉讲学，其内容在1970年出版了《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基础》一书，此书专门阐述图书馆学的基本理论，为图书馆界重视。1956年卡内基公司为谢拉提供为期三年的研究资助金，研究图书馆学教育问题，六年以后他取得研究成果，1972年出版了题为《图书馆学教育基础》的专著，并于1974年获得斯凯克鲁出版社专门奖。

在这本五百多页的巨著中，谢拉试图赋予图书馆教育更强的理论性，强调其跨学科发展的远景，因而在广泛的背景下趋向于探索一般性的原则。全书分为十四章，作者从个人和

社会交流系统出发，探求图书馆的社会作用。他认为“交流是社会结构的胶粘剂”，“图书馆是交流锁链中的一环”。图书馆工作的认识论基础是社会认识论，图书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教育作用和传递情报的作用。社会的背景和专业的作用决定了图书馆员是人们和文字记录知识之间的中介，他们的目的和职责就是为人类的利益，促使记录知识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利用。积累、组织、提供记录知识以便利用是图书馆职业活动的三个领域。因此，图书馆员应有的基础知识是人类知识和经验，是记录知识的内容，当然也需要一些组织、环境、文化等方面的辅助知识。那时，图书馆工作正在迅速走上现代化、标准化的道路，缩微、声像、计算机等新技术的应用促使图书馆学领域刮起变化之风，各学科的专门图书馆学、文献学、情报科学应运而生，图书馆员的职业也由于工作重点不同而出现分化。除一般的图书馆员之外，有专业馆员、科学馆员、文献分析专家、情报科学家等更加专深的人才，教育必须适应这种变革。谢拉在这种理论基础和社会背景之下，研究图书馆学教育，对专业教育计划、博士培养计划、教员的配备和教学行政管理等方面做了分析，提出他认为可供选择的对策。本书从着手研究到正式出版，经历了十六年之久，充分显示了作者的智慧和研究的功力，是他最为得意的成功之作。

综观谢拉一生的成就，除了对图书馆、情报、文献的实际工作和对图书情报教育的贡献及培养了大批人才之外，他的思想和学说还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世界图书馆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图书馆学的著作大多是一

些管理规则、工具和方法，比较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哲学的思考。三十年代在美国图书馆界出现了以皮尔斯·巴特勒为首的芝加哥学派，他们努力把图书馆学变成严密的学科，试图严格确定图书馆学的术语定义，对大量的图书馆现象进行社会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提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五十年代，法国学者P·卡尔斯腾曾用社会学的方法，从历史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知识社会学三个方面研究图书馆，在1954年出版了《图书馆社会学研究》一书。谢拉吸收了肯尼斯·布尔丁的“映象”论和托马斯·库恩的规范论，在芝加哥学派的基础上，特别是道格拉斯·韦普尔斯长期研究阅读的社会作用所奠定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社会认识论这样一个新的学科，作为图书馆学的认识论基础。知识怎样发生、发展和扩大，这是人们，特别是哲学家、心理学家长期研究的课题，著述甚多，但通常限于对个体认识的研究。怎样把已有的知识安排协调、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并用之于社会，不仅注意社会对知识的影响，还要注意知识对社会的影响，这就是谢拉提出的社会认识论的内容。他认为这是关于知识本身的一个知识实体，是一个几乎还没有被认识的领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了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语言学、生理学、心理学、数学、信息论等学科的跨界学科。社会认识论要研究整个社会中起作用的所有交流形式的形成、流通、协调和消耗，图书馆正是交流锁链中重要的一环。由此，谢拉把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建立在社会认识论基础上的图书馆工作根植于社会知识文化之中，从根本上讲，图书馆工作就是知识的管理。因此，要发挥潜力，为社会服务，图书馆可以做更多的工作。谢拉的

社会认识论对于图书馆开拓服务领域、深化服务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提供知识——情报的工作，有现实的意义；显然，也有助于理解图书馆工作的学术性，有助于确定和提高图书馆工作的社会地位。

第二，谢拉认为图书馆事业是总体的一般性名称，文献工作和情报科学是图书馆事业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图书馆员进行工作必不可少的知识和理论。显然，谢拉所讲的图书馆并不是传统的藏书楼，也不仅仅是图书之馆，而是社会记录的情报知识之积累、组织与提供利用的场所。谢拉一方面积极投身于文献工作和情报科学的实践，创立文献与通讯研究中心，使用全新的情报存贮与检索技术，参与有关的活动，把文献工作、情报科学与图书馆工作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努力发展文献学、情报科学的教育研究，确认情报传递乃是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共同基础，两个学科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本来是同盟者，因而主张协调，为防止两者的分裂做出了贡献。这里，谢拉强调图书馆必须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发展，反映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图书馆这样的社会部门最大的敌人就是僵化，不能满足各种需求。在图书馆事业面向现代化方向，情报科学、文献工作、以及各科专门图书馆学产生发展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大体一致的认识。学科不断分化，工作日益专深，这是客观的形势，但学科相互交叉协作，工作相互渗透关联也同样在加强，这也是客观的事实，更何况本是同根生的图书馆学与情报科学、图书馆工作与文献情报工作呢？其相同、相似、相关、交叉渗透之处必然更多，其千丝万缕的联系应当维系和加强。作为信息交流的机构，图书馆和情报部门尤其不应当形成隔离和互相

封闭，在一个基层单位也没有必要搞成平行的两个部门。

第三，谢拉认为，他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并非一件实物，而是一种思想，即“图书馆事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由众多互相依赖、互相关联的因素统一协调的整体”。这是一种系统论的思想。作为一个图书情报部门，不仅要处理面临的人类记录知识的复杂内容，还必须面对多方面的因素：历史的发展、现在的实践、未来的趋势；所接触的多种机构，政府的、学术的、产业的等等，服务的对象以及为之服务的部门；各种文化知识背景；必须的物质设备；人事往来以及行政和日常事务，各种因素要协调配合，才能正常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能。作为图书馆事业，各个图书馆也要组成互相依赖、互相合作的统一协调整体，才能发挥强大的整体功能。因此，谢拉从三十年代起就致力于协调统一的工作，他指出：“怎样使我们复杂的图书馆系统在协调管理下最好地运行，其浪费可以受到限制，这个问题已经提出。回答在于建立一个集中的计划委员会，由本专业的优秀人物组成，它不单纯有咨询的职能，也要有广泛而明确的管理权力。这个委员会可以在联邦政府的某个部管辖之下，但这并不是绝对必要，重要的是让它有权威和权力去致力工作。”^①经过多年努力，到六十年代，谢拉这一主张得以实现，美国在约翰逊政府时期建立了国家图书馆委员会，作为总统的咨询机构，七十年代初改名为国家图书馆和情报科学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974年提出了一个图书馆和情报工作的全国计划，1975年又提出了行动目标，在美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转引自参考文献4，第105页。

“谢拉对我们的奉献几乎无法计量”。②这是著名图书馆学家V·W·克拉普对谢拉的评价，克拉普曾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代理馆长，创建并长期领导美国图书馆资源委员会的工作，他的意见当可代表美国图书馆界。

《图书馆学引论》出版于1976年，是谢拉晚年的重要著作。它的出版曾引起图书馆界的广泛重视，成为世界图书馆学基础课程的主要教科书之一。作者的目的本来在于向开始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人们提供一个入门点，但由于他广博的思想，丰富的背景知识，深入浅出优美流畅的文字，读来步步引人入胜，可以看成作者毕生学术思想的浓缩、提炼和通俗化，完全可以供我国图书馆界乃至一般读者阅读，借以了解西方图书馆学的基本状况和理论观点，进行分析、比较和研究。

谢拉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的时代，比较以前的学者，他确实有进步和发展，但也有本身的局限。例如，他提出了社会认识论，但并未深入展开，更未能论及社会认识论的阶级根源和影响；他深知情报学是对传统图书馆学的挑战，但他仍坚持情报学只是图书馆事业的一部分；他讲图书馆学，注重对实际知识的了解，但把图书馆员的知识做百分之九十的实际知识与百分之十的图书馆专业知识的划分，甚至认为这百分之十也只是“职业手腕儿”，似乎又在否定图书馆学，如此等等。我觉得很可能从谢拉书中提出的问题比他解答的问题更有意义。关键在于我们阅读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分析比较的态度。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简单地贴标签、戴帽子，加以拒绝，或者囫圇吞

②转引自参考文献1，第316页。

枣，全盘吸收都是没有好结果的。

本书主要执笔的译者张沙丽同志是兰州大学外语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1982年的毕业生，被分配到该校图书馆工作之后，曾去上海大学（原复旦大学分校）进修一年图书馆学专业，现在开始在兰州大学图书馆学系担任《西文工具书》课程的教学工作。在兰州大学图书馆馆长兼图书馆学系系主任王正宇同志的支持下，在外语系张舒平教授的帮助下，张沙丽同志承担较重的翻译校对任务。作为一个初进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领域的青年同志，她的扎实努力和她所取得的成绩，都是令人鼓舞的。王馆长和张教授奖掖后学的精神也令人钦佩。承王馆长推荐，要我为本书作序，我未做深入研究，自知力不胜任，但感义不可辞，盛情难却，只好勉力为之，写了上述不成熟的看法，作为引言，供读者参考。

从1982年以来，我国有三千多名非图书情报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到高校图书馆从事图书情报工作。在这批青年同志的身上寄托着高校图书情报事业的希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确实不负所望，积极努力，奋发有为，为开创高校图书馆工作的新局面做出了贡献，一大批青年同志已经成为我们事业的骨干力量。我国高校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需要大量掌握各种专业知识的人才，因此，除了从图书情报专业分配人才之外，我们还要继续从非图书情报专业选用更多的人才，并且努力创造条件，让他们尽快掌握图书情报专业知识。我们相信，在新技术革命的形势下，在我国四化建设中，图书情报事业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肖 自 力

一九八六年四月五日于北京

参 考 文 献

1. 《外国图书情报界人物传略》侯汉清等编译,山西省图书馆学会出版,1984年。

2. “谢拉及其社会认识论”, 庄义逊编译,《图书馆学通讯》1984, (1), 80—85。

3. 弥吉光长: “图书馆通讯”, 东京理想社1982年版。

4. Molz, R. K. National Planning for Library Service, 1935—1975. Chicago, ALA, 1984

5. Shera, Jesse Hawk, Kent, A and Perry, J. Information Systems in Documentation. N. Y. Interscience Publishers, Inc 1957.

6. Shera, J. H. Librar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1965.

7. Shera, J. H. Documentation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Crosby Lockwood, London, Archon Books, Hamden, Conn. 1965. Collected essays edited by D. J. Foskett.

8. Shera, J. H. The Soc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ibrarianship, Asia Publishing House, Bombay, India and New York, 1970.

9. Shera, J. H. The Foundation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Wiely-Becker and Hayes, New York, 1972.

著名物理学家尼尔兹·包尔①常常对学生讲：“你们应当把我讲的每一个论断作为一个问题来理解。”斯科特·布坎南经常询问圣约翰学院的学生们：“你们怎么样？你们信任你们的脑筋并相信你们天生的思维能力始终清醒吗？你们在生活和学习的时候是否意识到那种能力的作用？……你们在以前、今后以及在圣约翰学院生活时，是否给自己当过老师？是否认识到你们现在是、而且一直是自己的老师？普通教育是以自由思想为目标的，而自由思想一定是它自己的老师。当一个人同苏格拉底说他一无所知，并继续说：我明白我不知道的是什么，这时就是思想自由的开始。那么我要问：你们知道你们在哪些方面无知，因此你明白应该知道什么吗？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而又很谦虚的话，那么你们就是自己的老师。你们就会给自己安排任务，并成为自己最好的批评家。”②

这样的问题是人文主义者的问题。这类问题同图书馆员有着特别的关系。尽管图书馆学在逐渐利用各门科学的研究成果，同社会科学有紧密联系，但其实质依然是人文主义的。说它是人文主义的，是因为从根本上讲，它研究的是人类思想和伟大探索的文字记录之间的那种微妙的、难以捉摸的关系。把图书馆学划分到社会科学，是因为图书馆作为一个部门是社会的产物，它的目的是通过帮助个人了解他自己